

第一章 中国古代仿古瓷概说

仿古瓷是中国古代瓷器中一种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工艺现象。它主要形成于元代，成熟于明代，繁荣于清代前期，衰落于清代后期。基本上存在于中国古代瓷器发展的后半期，并对这一时期瓷器的发展进程，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在中国古代瓷器中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的瓷器文献，对仿古瓷的记述较少。虽然一些文献在记述古代瓷器的发展时，对仿古瓷作过一些重点强调或专门介绍，但这只限于笼统的说明和概括的叙述，而未细致地表述出仿古瓷的具体面貌和特征。如清唐英《陶冶图说》中，仅提到“仿古以多见能精，此青花之异于五彩也。”^①唐英《陶成纪事碑》中，记述当时制供御器 57 种，其中有仿宋代名窑瓷器和仿明代瓷器多种；但只是列出器名而已，未作具体描述。清蓝浦《景德镇陶录》，是古代瓷器文献中记述仿古瓷较多的一种，其中列举了元、明、清各朝景德镇仿制古代瓷器的简目，又介绍了景德镇所仿古代瓷窑瓷器的概况。^②但这两部分均未描述出仿古瓷的具体面貌特征。至晚清与民国时，由于瓷器仿古作伪之风日盛，研究古代瓷器的著作带有不少鉴赏辨器的成分，因而对仿古瓷也多有涉及。但也限于零星介绍和单纯列举。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古代瓷器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一方面瓷器考古的新成就对古代各种文献的综合研究、对现存博物馆藏品的深入考察，以及研究角度

的不断更新,使古代瓷器研究的学术水平迅速提高 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的开放,瓷器也作为一种商品进入流通领域,使辨伪鉴定问题越来越迫切地摆在人们面前。在这两方面因素的推动下,古陶瓷研究领域对仿古瓷的研究也逐步得到重视和加强。如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耿宝昌先生在《明清瓷器鉴定》中,对明清时的仿古瓷涉及较多,^③这可以说是迈开了系统研究中国古代仿古瓷的重要一步。另如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叶佩兰先生在其所编图录^④和发表的论文中,对明清时仿古瓷发展过程中重要时期的制品,进行了深入介绍和分析。这些都无疑开辟了仿古瓷研究的新天地。笔者试在上述两位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将仿古瓷研究的系统化和对其进行深入介绍与分析结合起来,以使我们对中国古代仿古瓷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认识。

一、概念

仿古瓷在许多研究古代瓷器的文章中都曾提及。而且作为中国古代瓷器的一种特殊制品,它在一些陶瓷辞典中,亦得到专门评介。如《中国古代瓷器基础知识》仿古瓷条目中说:“后朝模仿前朝的名瓷品种而烧造出来的瓷器,称仿古瓷。仿古之风,早在宋代就很盛行,当时已出现了大量仿制商周青铜器,同时一些地方瓷窑,也不乏刻意仿古者。”^⑤另如《中国古代瓷器鉴赏辞典》仿古瓷条目中说,仿古瓷即“仿古代或后朝仿前朝青铜器、陶器、瓷器、漆器而烧制的瓷器,仿古瓷宋代已盛行……。”^⑥这两个条目对仿古瓷释义的根本点,就是不同程度地认为仿古瓷是以历史上一定时期的瓷器为单位或确定点,凡是这个单位或确定点的瓷器中,有摹仿它以前任何时期的任何工艺的器物,都叫仿古瓷。笔者认为这种释义有些欠妥。

首先,在仿古瓷的概念中,仿古代工艺的瓷器与仿古代的瓷

器是一种不可分割的因素，而不是两个并列的因素。前者反映的是仿古瓷的基本特征，后者则反映的是仿古瓷的特定对象；也就是说仿古瓷是一定时期的瓷器模仿它以前的工艺，这种工艺不是其它工艺，而是瓷器工艺。因此，仿古瓷必须是瓷器范围内的仿古，而不能超出这个范围。这一点已在诸多陶瓷研究的文章与论著中得到反映。

其次，在中国古代瓷器中，确实有许多器物是模仿古代陶器和商周时的青铜器的。这种现象反映出中国古代各工艺之间的一些相通之处。如一件器物，其外部形式确定后，既可以做成陶器，做成青铜器，也可以做成瓷器。这种相通的工艺特性，反映出工艺在横的方面具有渗透功能。同时，中国古代瓷器在接受其它工艺渗透的同时，往往注意吸收自身出现之前已较为成熟的工艺成果。如中国古代瓷器出现于东汉晚期，在此之前，陶器、青铜器乃至玉器等许多工艺已十分成熟，出现了许多具有鲜明特色的形制。瓷器的出现不是凭空产生，而是在陶器发展的进程中逐步形成，因此它最初不可避免地要带有陶器的因素，而瓷器对陶器这种在工艺上的继承关系，是一种自然发展的结果。因此，虽然瓷器在后，陶器在先，但是不能说瓷器是一种仿古结果。瓷器出现以后的一些基本形制，如碗、盆、罐等，一般都来自新石器时代和先秦时期的陶器，然而不能就因此而断定这些器物就是仿古瓷，否则的话，中国古代瓷器在总体上也就成了仿古的结果。此外，在中国古代瓷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宋代、明代、清代，许多器物都摹仿商周时期的青铜器。这些器物不是出现于中国古代瓷器工艺的初始阶段，而是出现于中国古代瓷器的发展已达到较为成熟的时期，这类器物如何看待呢？实际上这类器物也应属一种工艺上的延续，而不能说是仿古瓷。因为在中国古代瓷器的发展过程中，有继承陶器和青铜器的传统。如商周时期的青铜鼎炉形式，自瓷器出现时始，直到晚清，都在瓷器中广为出现，而且

不断地变换着形式。另如陶器和青铜器中的尊等，亦在瓷器上得到较长的沿袭。因此，中国古代瓷器中摹仿商周青铜器的器物不是凭空产生，而是长期工艺延续的结果。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瓷器工艺在纵的方面有延续的功能。

再次，耿宝昌先生在其《明清瓷器鉴定》中介绍了明清时仿古瓷的情况。在这里，仿古瓷指那种仿制前朝瓷器的制品，而并未包括那些形制来源于远古陶器和青铜器的制品。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仿古瓷指的是那种在中国古代瓷器发展过程中，一个时期的瓷器里出现的模仿这个时期以前瓷器工艺的制品。

二、分类与范围

中国古代仿古瓷是中国古代瓷器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古代瓷器所具有的一些基本因素，它也同样具备。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瓷器作为具体器物的构成因素，包括胎体、造型、釉彩、纹饰、款识五个方面。中国古代一定时期的瓷器对它以前一定时期瓷器的仿制，便自然要凭这一时期的工艺材料和手段，刻意达到它以前一定时期瓷器的具体面貌和外在效果。在这里，仿者与被仿者的一致或近似，就是仿者与被仿者在上述几种因素总体上的相近，或这几种因素某一个方面的相近。因此，中国古代仿古瓷，包括仿器物、仿造型、仿釉彩、仿纹饰、仿款识五个方面。

仿器物 顾名思义是仿完整的器物，是仿器为达到与被仿器完全相似，而摹仿被仿器各个方面或绝大多数方面的因素。这种摹仿，不仅摹仿前述几个方面因素的单纯效果，而且摹仿它们之间的协调效应，即器物整体的综合神气，以使仿器完全达到逼真的效果。仿器物是仿古瓷中最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它的仿制对象一般是中国古代瓷器中那些久负盛名的瓷窑所生产的制品。如

宋代的五大名窑（汝窑、官窑、哥窑、定窑、钧窑）制品、明代永乐和宣德时的青花瓷器、明代成化时期的斗彩瓷器。这些名窑瓷器由于多是历史上供皇家宫廷使用的制品，因而原料精良、技术优秀、制作考究，是代表了中国古代制瓷工艺高超技术的经典之作，历来受到皇家和民间的青睐。因此，后世宫廷竭力仿制这些制品，不仅要炫耀本时期制瓷水平的高超，而且借仿古再现而自我玩味，反映出在精神生活中的风雅趣味。同时在民间，仿制者借商品经济的发展，官窑在民窑烧瓷，官窑制瓷体制有所松弛之故，也仿制历史上的名窑瓷器，借此迷惑世人，以牟私利。流传至今的古代仿制名窑瓷器的制品，官窑和民窑的器物都可以见到，正反映出这种历史现象。

仿造型 即仿制器物的造型形式。造型是瓷器构成的重要因素，它是胎体性能的体现者，又是釉彩工艺施展的舞台。但是，由于中国古代仿古瓷中仿造型制品受到两方面情况的制约，因此被真正确认者实际上很少。首先，上述仿器物制品中包含了相当一部分仿造型制品。由于造型和釉彩是瓷器上最引人注目的两个组成部分，因此仿造型必定要仿釉彩，使得单纯仿造型者较少。其次，仿造型的制品还受到形式延续的制约。由于中国古代瓷器中许多造型都是世代相袭，延续久长，要在这些造型中找出仿造型的器物是很难的。因此，仿古瓷中的仿造型制品应该是仿制那种历史上较为独特的，罕见的，不具有延续特征的制品。如唐代的串铃盒，是当时较为独特的制品，唐以后甚为罕见，唯到明代嘉靖时，青花瓷器中见有此种造型，可见嘉靖青花串铃盒是对唐代串铃盒造型形式的一种有机的模仿。

仿釉彩 即仿制器物的釉饰和彩饰。釉彩是瓷器的外部装饰，它与瓷器的造型相比，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由于造型一经形成，往往与器物的功能联系在一起，因此，便成为固定模式，使仿制者不能回避；而釉彩则可以选择任何一件器物来作为自己的表现对

象。正是由于这一因素，中国古代仿古瓷中才出现了那种在具有本朝造型风格的器物上施以前朝瓷器上的特定釉饰的现象。如宋代的汝窑、官窑、哥窑等瓷器不以造型取胜，而以釉饰见长，明清时期仰慕之，则在具有本时代造型风格的器物上施以仿汝釉、仿官釉、仿哥釉。

仿纹饰 即仿制器物的纹饰形象。这类仿古瓷的特点与前述仿造型器物的特点相近，主要表现为制品数量较少，仿制特征不甚鲜明；但确有存在。如晚清时烧制的青花红彩海马奔浪碗上的纹饰，就是模仿明万历青花海马奔浪碗上的纹饰所描绘而成。

仿款识 即仿制器物的款识，或信手写来所仿器物的款识。这种仿古瓷指单纯的仿款识制品，并不包括那种仿器物全貌而同时仿款识的制品。如清代康熙瓷器中的许多制品，原本面貌属康熙瓷器风格的制品，但却于器底仿写或随意书写明代宣德年款、成化年款、嘉靖年款等，反映出对明代名窑瓷器的仰慕。一般来说，随意写款者不属一种仿制行为；但由于所书款识的内容容易造成一种假象，使不熟悉中国古代瓷器的人误以为这些器物是明代制品，因此仍被包括在此项之中。

三、仿古瓷与形式延续的关系

仿古瓷与形式延续的关系问题，是认识仿古瓷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前面述及仿古瓷的概念时，已初步涉及到这个问题。

仿古瓷的概念，前面已经明确，那么什么是形式延续呢？首先，形式延续主要是讲瓷器造型形式的延续，其次才是釉彩、纹饰上的延续。因为釉彩的延续很明确。如青釉，自瓷器出现时始直到清代，始终作为瓷器的装饰而存在，因此不能说清代青釉是对瓷器刚刚出现时的青釉的仿制。再如粉彩，自清代康熙时出现

以来，一直延续到清末；但也不能说清末粉彩是对康熙粉彩的仿制。而造型形式除前述对中国古代陶器和商周青铜造型的延续外，还表现为瓷器自身造型形式的延续。如六朝时的鸡头壶，在这一阶段的每个时期几乎都有出现，造型形式也较为相近，那么可不可以说，第一个出现的器物，是后面出现器物的被仿对象呢？笔者认为不可以，因为此种制品的出现，是与当时的社会风俗和生活习惯密切相关的，它们之所以被一再制作出来，正说明了这个时期在社会风俗和人们的生活习惯中有一致的地方。由此而推及大的方面，如瓷碗自瓷器出现始直到清末一直在制作，正说明瓷碗这种器物适合于从远古到近古人们一般的生活习惯。其次，釉彩在形式延续上虽不属主要角色，但作为次要角色，也有值得一提之处。再以青釉为例，青釉在总体上是延续的，而在局部上却存在着间断性。如汝窑釉饰，只有在汝窑存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延续。汝窑不在，而瓷器上出现了汝釉，则只能是仿汝釉，即仿古瓷中的仿釉彩。

综上所述，形式延续是瓷器在工艺形式上所具有的历史伸展性，这种伸展性或贯穿于历史的始终，或贯穿于历史的一定时期。

仿古瓷与形式延续的关系如何呢？

形式延续是中国古代瓷器发展的根本特性。中国古代瓷器正是靠这种工艺形式的不断延续，生生不息，不断达到自身的完美境界。而仿古瓷，则是中国古代社会和瓷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首先，形式延续是仿古瓷的基础，是仿古瓷不可缺少的前提。因为，虽然形式延续在自身的演变过程中给人以形式相近的印象，但不同时期的形式具有不同的特点，于是不同时期形式效果的优劣就自然呈现出来，促使人们去追求效果优良的形式。同时，形式延续往往给仿古瓷提供必要的工艺手段。如一种釉彩如果由于延续性中断，那么就会使后世的仿制在工艺效果上与所仿制品产

生距离。

其次，仿古瓷对推动中国古代瓷器的发展，促进形式延续，具有不能忽视的作用。一般来说，仿古瓷大多模仿的是中国古代的名窑瓷器，这些名窑之所以有名，就在于它们所生产制作的瓷器不但工艺精良，而且具有鲜明的个性，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制瓷工艺的美妙境界。但由于历史发展的限制，一些名窑的瓷器因窑窑停烧而停止生产，从而造成了形式延续的中断。仿古瓷的形式虽不是名窑瓷器自然的形式延续，但却使其在另一种意义上得到再现。仿古瓷的出现，丰富了仿古时期瓷器工艺的表现力，促进了当时对瓷器新品种的开发，创造一种新的形式延续的开始。同时，仿古瓷还促进了新品种瓷器出现以后的延续过程。如斗彩出现于明代成化时期，是五彩工艺的一种特殊的组合，是成化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当时的人们只认识到有五彩，并未认识到有斗彩。但由于成化斗彩工艺精良，风格隽秀，给人们以优雅的感受，因而引起后世人们的极大仰慕。成化以后的许多时期，都竭力仿制成化斗彩瓷器，以此来作为自己制瓷工艺上的难能之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清代前期，斗彩逐渐脱离了仿制成化斗彩的轨道，沿着发展自身特色的道路向前迈进，人们也终于认识到斗彩是一个独特的彩瓷品种。此外，仿古瓷还可以促进形式延续中新风格的出现。如清代雍正、乾隆时期的青花素以模仿明代永乐、宣德青花而闻名；但由于其时不具备永乐、宣德青花的制作工艺条件，因而便以人工点染的方法趋附之。如此一来，雍正、乾隆青花纹饰在追求国画的表现风格时，这种人工点染的方法便成为表现形象层次，加强形象立体感的重要手段。采用这种方法描绘的青花形象，其效果与古人用披麻皴法描绘形象的效果一样，具有传神的表现力。这样，青花这一瓷器工艺的表现形式便以清新的面貌向前延续。

四、仿古瓷产生和发展的时代条件

中国古代仿古瓷从目前所见实物看，主要形成于元代，发展于明清时期，这是由政治、经济和工艺技术方面的因素所促成。

（一）中国古代社会进入元代，开始较为显著地呈现出腐朽没落的面貌。为满足宫廷豪华奢侈的生活和腐朽没落精神趣味的需要，统治者特别重视御用瓷器的生产制作。元代时，御用瓷器的生产方式是“有命则供，否则止”^⑦即宫廷用瓷在民窑烧制。不过，这种民窑不是一般的民窑，而是民窑制瓷业中制瓷工艺精湛的窑场。“有命则供”是指在宫廷需要瓷器的时候，命官吏到民窑督造瓷器，这种瓷器或按民窑固有瓷器的样式生产，或按宫廷设计的瓷器样式生产。“否则止”是指在宫廷不需要瓷器的时候，民窑即停止烧造御用瓷器。明代时，政府于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设立官窑御器厂，^⑧专门为宫廷生产御用瓷器。随着明代制瓷业的发展，御用瓷器需求量的增大，官窑御器厂的建制逐渐完备，分工也越来越细密，运作能力逐渐提高。但由于官窑御器厂以超经济的封建专制为前提，封建压迫极为严酷，加之官窑瓷器主要迎合宫廷趣味，形式单一，缺乏创意，官窑御器厂一度陷于严重的危机状态。如“官作趋办塞责，而私家则竭作保佣，成毁之势异也。”^⑨于是政府采取“官搭民烧”之策，“分派散窑，其能成器者受嘱而择之，不成瓷者责以必办。”^⑩使官窑御器厂无法完成的制瓷任务，分配给制瓷技术较好的民窑来完成，借以盘剥民窑，使其无法发展壮大，竭力维护官窑在制瓷业中的统治地位。清代时，特别是康熙二十年以后，政府对御用瓷器十分重视，一方面派多位督陶官去景德镇御器厂监制瓷器，另一方面则将民窑日益发达的制瓷业当作自己服务的一种工具，因而出现了“尽搭民窑”^⑪的现象。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对官窑瓷器的生产极其重视，尤其是乾隆

帝，不仅对制瓷生产的具体环节作出规定，经常对督陶官的作为提出要求，而且喜欢在宋代名窑瓷器和本朝珍品上题写御题诗，并不惜工本地利用奇巧的制瓷工艺来满足自己的精神趣味。

以上因素给仿古瓷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环境。首先，元、明、清封建统治上的腐朽，使瓷器这种工艺由原来一般的工艺品上升为高级玩赏品。特别是明清时的几位皇帝对瓷器生产尤为重视，更使瓷器的玩赏性得到加强。而仿古瓷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古代名窑瓷器可以在今天再现”的玩味中生产出来。其次，官窑御器厂的设立，对民窑优秀制瓷工艺的榨取，既使仿古瓷可以在分工细密，专业化程度较强的条件下进行生产，又可以因工艺技术的精良，使仿古得以逼真、充分地完成。

（二）中国古代仿古瓷的发展曾出现了两次高潮：一次是在明代中晚期，另一次则在清代前期。而这两个时期正是明清两代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高涨时期。

明代中晚期，社会经济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这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由于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技术的提高，使农业得以迅速发展，并有力地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当时冶铁、铸铁、制瓷、棉纺织的发展较为充分，这不仅使从事手工业的人数大大增加，而且还有力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如农业、手工业产品成为商品，商人增多，出现了“其货之大者摘叶为茗，伐楮为纸，坯土为器，自行就荆湖吴越间，为国家利”^⑫的现象。雇佣手工业工人的人数增加，雇主与雇工的关系是“机户出资，机工出力”^⑬的关系。在制瓷业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集中表现为民窑瓷业的兴旺及对官窑瓷业的巨大冲击。这时期，景德镇民窑不仅规模庞大，而大多实行雇佣劳动，小生产者日益变为商品生产者。“……曰雇役（本厂选召白徒高手烧造，及色匠未备，为敲青弹花裱背匠等役）……”^⑭这种雇用劳动比官窑使用劳役劳动生产率高，产品逐渐

精进。^⑮这说明民窑生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清代前期，耕地面积较明代大为扩展，许多荒芜的土地得到开垦。农业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使桑、茶、棉花，甘蔗、蓝靛、烟草的产量都有较大的提高。手工业日益繁荣，各种手工业作坊纷纷涌现，商品的品种较明代更为丰富。商业繁荣表现为商业往来的频繁，商业城市的数量增多，西北出现了“商旅满关，茶船遍河”^⑯的局面。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表现为手工业作坊分工细密，雇主与雇工是货币工资的雇佣关系，而且雇工多为短工，与雇主没有主仆名分。^⑰其资本主义性质十分显著。在制瓷业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仍然集中表现为民窑瓷业的兴旺及对官窑瓷业的巨大冲击。这时期，官窑瓷器数量惊人，制作精美绝伦；但这些制品大多数是政府实行“官搭民烧”政策，利用民窑的制瓷生产力而完成的。^⑱这反映出清代前期民窑制瓷业的兴旺，也反映出官窑制瓷业不再压制民窑，而是充分利用民窑发展的成果来为自己服务。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为仿古瓷的生产提供了如下的条件：首先，由于民窑的发展，形成了“官民竞世”的局面，从而刺激了制瓷工艺水平的提高，使仿古瓷的制作得以顺利完成。其次，分工的细密使制作工匠有机会对古代名窑瓷器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从而使仿古工艺变得更为准确而全面。再次，市场的形成，封建统治在一定程度上的松弛，也使仿古瓷成为商品，汇入商品经济的大潮，从而刺激了制瓷工匠制作仿古瓷的积极性。

（三）仿古瓷的出现是中国古代瓷器工艺开始衰退的表现，这一点是与中国古代社会趋向腐朽没落相适应的。前面提到仿古瓷的出现促进了中国古代瓷器的发展，而这里又说它是中国古代瓷器衰退的表现，这不是很矛盾吗？实际上，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中国古代瓷器的发展，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东汉晚期——宋代阶段和元、明、清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中，中国古代瓷器的发展经历了起步、成熟、形成第一个高峰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也基本上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由成熟而达极盛的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以青瓷为主体，兼具其它釉彩工艺演变的瓷器发展，基本上呈上升趋势，即瓷器发展沿着健康的轨道，一步一步地迈向自身的完美境界。如青瓷，由东汉晚期的制作水平，提高到唐、五代越窑“秘色瓷”的制作水平，再提高到宋代汝窑瓷器、官窑瓷器、哥窑瓷器那种妙不可言的完美程度。这种逐步上升的发展趋向，始终保持着瓷器本身纯朴、天成的特性。

在第二个阶段中，中国古代瓷器生产的中心，逐渐转移到景德镇，而景德镇的制瓷优势一直保持到清末。在这个阶段，瓷器的发展继承了第一阶段瓷器的发展成果，并逐步形成了中国古代瓷器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其制瓷工艺达到前无古境的地步。但这种发展并非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而是呈现较为曲折的面貌。而这个发展过程，也基本上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由盛期走向最后衰落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品种的釉彩瓷器不断被生产出来，简直无奇不有，无所不能，而制胎工艺也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但这种状态是与制瓷工艺的低劣状态互为交替，最终以制瓷工艺的低劣状态而告结束。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许多瓷器尽管釉彩工艺是高超的，制胎工艺也是高超的，而将它们结合的工艺却是低劣的，平俗的。这说明瓷器的发展未能始终沿着健康的轨道，因而也无法达到自身的完美境界。如青花，由元代到明代永乐、宣德时达到崭新境界，接下来便长期处于无所适从的状态，到清代康熙时又达到了一种崭新的境界，然后又处于无所适从的状态。这种起落不定，最后趋于没落的发展状态，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瓷器本身纯朴、自然的特性。

而在这个阶段，这种状态下，仿古瓷找到了自己适宜的生存环境和养料。首先，起落不定的发展状态为仿古瓷的制作创造了契机。当瓷器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就会从这个高度降下来，陷入徘徊状态。在这个状态中，仿古瓷往往起到支撑瓷器发展局面的作用。较为明显的例子如清代雍正、乾隆时的青花瓷器中有相当一部分制品，由于创造不出自身的特色来，因而以摹仿永乐、宣德青花瓷器为自身特色。在这里，仿古瓷的出现一方面表明这时期瓷器工艺的衰退而无从进取，另一方面又可以演化出新的形式，促进瓷器工艺的发展。其次，即使在一个品种的瓷器达到一种高峰时，由于制瓷工艺缺乏主创意识，或专门生产仿古瓷来显示制瓷工艺的高超水平，仿古瓷依然会大量出现。这里所反映的是在中国古代瓷器发展的第二阶段，制瓷工艺的复古现象是一种经常的，带有习惯性的现象。

注释：

- ① 清唐英《陶冶图说》第十一《圆器青花》。
- ② 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二《国朝御器窑厂恭记》，卷六《镇仿古窑考》。
- ③ 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第十四章《仿古与后仿瓷》，紫禁城出版社。
- ④ 叶佩兰《古瓷辨识》概述，台湾图书艺术公司出版。
- ⑤ 《中国古代瓷器基础知识》，江西省文化厅文物处编印。
- ⑥ 《中国古代瓷器鉴赏辞典》，新华出版社。
- ⑦⑨⑩ 《浮梁县志·陶政》。
- ⑧ 清朱琰《陶说》卷三。
- ⑪ 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十，郑廷桂补辑《陶录余论》。
- ⑫ 《饶州府志》卷四《舆地志》。
- ⑬ 《明实录·万历实录》卷三六一。
- ⑭ 明王宗沐《江西大志·陶书》。
- ⑮ 甄励《明代景德镇民间青花制瓷业述略》，《景德镇陶瓷》 1986年第

3 期。

⑩ 《新疆纪略》七十一。

⑪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

⑫ 王钰欣《明清两代景德镇的官窑生产和陶政》《清史论丛》三。

第二章 中国古代仿古瓷的起源

形式延续是中国古代仿古瓷制作的基础，也是蕴育它出现的根本因素。

《墨子·亲土》中有这样一句话：“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江河之水的汇成，非一种水源，而是有许多水源；千镒（镒：古代重量单位，二十两或二十四两）的皮袍制成，非一个狐狸的皮毛所成，而是由许多狐狸的皮毛制成。但是，江河之水不是由其它东西汇成，而是由水汇成；千镒皮袍不是由其它东西制成，而是由狐狸的皮毛制成。

将上述道理运用于中国古代仿古瓷的起源，便是仿古瓷是由中国古代瓷器发展过程中的许多因素汇集而成。但这许多因素是限定范围的，这个范围就是能够引起仿古瓷出现的形式延续的因素。一般来说，形式延续包括一般形式延续和特殊形式延续两种，而特殊形式延续则又包括同种器物的时代延续、不同瓷窑制品的相互延续、对其它工艺形式的延续。

此外，从中国古代仿古瓷起源的角度来说，形式延续又有时间上的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之分。如中国古代仿古瓷出现于元代，那么从时间上讲，东汉晚期——五代的形式延续是间接因素，宋代的形式延续则是直接因素。

下面以时间的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为经，以一般形式因素和特殊形式因素为纬，对中国古代仿古瓷的起源作一探析。

一、东汉晚期—五代的形式延续

东汉晚期——五代的瓷器发展，是中国古代瓷器由出现到成熟的过程。

东汉晚期瓷器刚形成时，其制品还显得较为单纯，主要器物有罍、甗、罐、壶、盆、洗、碗、钵、盘、盏等。这些器物一般是从陶器演变而来；不过，这种陶器是一种特殊的陶器，即陶器的胎土中逐渐添入了一些瓷土因素烧制而成的制品，这就是“原始瓷”。原始瓷出现于商周时期，经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于东汉晚期发展成瓷器。东汉晚期出现的瓷器大多在商周至秦汉的原始瓷发展过程中已经存在。如商代时有原始瓷鬲底罍、鬲底钵、鬲底盆、双耳罐，周代时有平底碗，春秋时有平底甗，战国时有盘，春秋和西汉时有壶等。这些事实说明，中国古代瓷器的出现，不仅是瓷胎的本质和装饰釉效果的根本表现，而且是一种由陶器的器物形式延续而来的结果。即伴随着由陶器到瓷器的演变，器物形式也随之演变，瓷器一旦形成，那么它的器物形式，就是陶器器物形式延续的结果。如罐，商代时是敛口，深腹，圆底，有的器物还添加双耳；西周时演变成敛口，深鼓腹，圆底，有的器物亦添加双耳；秦代时演变成环形钮盖罐；东汉晚期瓷器形成时，已演变成直口，球腹的双系罐、四系罐及五联罐。从商代到东汉晚期，罐的表现形式不断变化，有的变化甚至较大；但罐器口适中，腹大于口的基本形式，仍始终得以保持。这种基本造型形式的延续，就是器物形式延续的最基本成分。瓷器出现时的器物，亦见有当时铜器的影子。如一种钟，大口扁腹，高圈足，腹部贴有对称铺首，其表现形式即延续当时铜器的造型形式。

（一）一般形式延续

瓷器出现以后，一般形式延续是它最经常、最普遍的演变方

式。这种形式延续在保持器物基本形式的前提下，基本上遵循原始瓷器的延续规律，根据社会习俗的变化，不断改变或增减形式因素的延续。

如碗，东汉时口沿较薄，深腹弧壁，平底；或口沿微敛，上腹鼓，下腹收，平底。西晋时，大口，浅腹，平底。南朝时，口沿微敛，弧壁下敛，平底。隋代时，直口，弧腹下收，平底。唐代时，碗的形式丰富多彩，有下腹内折的折腹碗、有口沿外撇的撇口碗、有模仿荷叶的荷叶形碗、有模仿海棠的海棠式碗、有口沿作出小缺口花边的四出碗、有八瓣形的八出碗、有口唇外翻的翻口碗。此外，唐代、五代碗足的形式，也由宽壁的玉璧形足演变成窄壁的圈足。

如盘，三国至两晋时出现分格盘；三国、西晋时为方形，东晋时则为圆形。南朝、隋代时，出现浅盘中置五个小盅的盅盘。东晋至唐代出现一个托盘内放一只耳杯的器物，名为盞托。此外，南朝时有敛口，翻唇，上腹鼓起的翻唇盘；有口沿坦张的坦口盘；隋代时有下承喇叭形足的高足盘；唐代时有模仿葵花的葵口盘。

如炉，汉、晋、隋时，有模仿蓬莱仙山的博山炉；三国和东晋时又盛行柱盘薰炉；西晋时出现足盘薰炉；六朝各时期又盛行镂孔薰炉；南朝时则出现带托的薰炉。

如尊，西晋时出现神兽尊，南北朝时出现莲花尊，隋代时出现盘口尊和盖尊，唐代时又有人形尊。

如罐，晋代至唐代盛行四系罐，隋代时则有八系罐；三国时出现三足罐和谷仓罐；晋代时有侈口，高颈，肩腹交接处有明显界线的直筒罐，唐代时，出现模仿塔状的塔式罐；五代时则出现横栓盖罐和釜耳盖罐。

如壶，东汉至唐代盛行一种盘口壶，壶体有两系、四系、六系不等；三国至唐代盛行一种唾壶；西晋至唐代盛行鸡头壶；西晋时出现铺首扁壶和鹰形壶；南朝时出现单柄壶和托盘壶；北齐